

大运河承载的“乡愁”

2500余年前开凿的大运河，不仅是历史上中华民族经济命脉，还孕育了丰富的古代文化财富。伟大的文学经典《红楼梦》与大运河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书里书外的“乡愁”

《红楼梦》第十九回写到宝玉与黛玉聊天，“宝玉问她几岁上京，路上见何景致古迹，扬州有何遗迹故事，土俗民风，黛玉只不答。”黛玉之所以不答，因为她“抛父进京都”沿河北上，这一路满是悲伤，一言难尽。《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香菱对黛玉说：“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湾住船，岸上又没有，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做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谁知我昨晚上读了这两句，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香菱对黛玉说的这番话，是不是隐寓着曹雪芹当年跟随祖母经大运河回北京的情景呢？

无论是写林黛玉自扬州乘船走运河“抛父进京都”，还是香菱学诗时与林黛玉说乘船走大运河回京都，这些都不是作者泛泛之语。历史上的大运河既给曹家带来了兴盛，也给曹家带来了败落，而这些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说《红楼梦》是曹雪芹“乡愁”的产物，可能有读者朋友会疑惑，曹雪芹祖籍东北辽阳，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北京并创作了《红楼梦》，最后在北京去世，为什么他的“乡愁”属江南？从籍贯来讲，曹雪芹的确是北京人，祖籍东北辽阳。不过入籍北京的曹雪芹一家几代人，却曾在江南生活六十五年之

久，不仅曹雪芹出生在南京，影响曹雪芹一生以及《红楼梦》创作的曹家兴衰也都发生在江南。曹雪芹的曾祖叫曹玺，他的妻子姓孙，在康熙皇帝出生以后，这位孙氏夫人被选为康熙皇帝的保姆，从此曹家就与康熙皇帝有了非同一般的关系，康熙甚至称呼孙氏为“吾家老人”。康熙二年（1663年），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被委以重任，担任江宁织造。从曹玺开始，曹家三代四人相继担任江宁织造长达五十八年之久。

待到康熙皇帝去世，雍正皇帝继位当年就查抄了曹雪芹的舅爷、苏州织造李煦的家。当时江南三织造之间的关系，正如《红楼梦》中描述的四大家族，“一损皆损，一荣皆荣”。雍正五年（1727年），曹雪芹的叔叔或是父亲曹頫骚扰驿站等事引发皇帝震怒，曹家被抄家，留驻江南六十余年的曹家从此败落。此时曹雪芹可能是十二三岁或者五六岁。雍正六年（1728年）春夏之交，他随祖母回到北京。从一个贵族公子哥儿变成一个落魄文人，大运河见证了曹雪芹经历的这个巨大反差。而这段坎坷经历，无疑对曹雪芹的生活和创作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运河见证的曹氏兴衰

我们阅读《红楼梦》时可能会产生很多疑问，比如作者为什么要写“金陵十二钗”，《红楼梦》为何从苏州写起，林黛玉为什么是从扬州抛父进京都，贾宝玉挨打后贾母为什么说带他回南京老家去，等等。关于这些疑问，我们可以从曹雪芹经历的家族兴衰中寻得某种回答。简而言之，没有这样的家

世经历，没有这样的生活感受，曹雪芹是写不出《红楼梦》的，因此我们如果不能理解“乡愁”对曹雪芹对《红楼梦》的影响，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红楼梦》。

以往大家总会探讨《红楼梦》为什么要从苏州写起，现在有了一些共识——因为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到江南担任的第一个职务就是苏州织造，而且后来江南曹家的衰落就是从苏州织造李煦被抄家开始的。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创作素材不仅来源于曹家的历史，很有可能也有苏州李家的历史。《红楼梦》中以贾母、史湘云为代表的“史家”，其素材可能主要来自苏州李煦家。李煦的儿子叫李鼎，而史湘云的叔叔是忠靖侯“史鼎”，其中的关系是有迹可循的。

除了苏州，扬州也是大运河上的重要节点，对曹家兴衰而言此地也至关重要。有读者读罢《红楼梦》，可能会误以为林黛玉不是苏州姑娘而是扬州姑娘，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误会，是因为林黛玉在《红楼梦》中首次出场便在扬州。

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起，曹寅和李煦轮流各管两淮盐务。曹寅去世后，康熙让李煦任巡盐御史。当时的盐政可谓肥缺，尤其是两淮盐政，几乎占到清廷盐税的十分之一。《红楼梦》第七十二回中贾琏说：“这会子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作者写出贾琏这一句，其中感慨是一般人很难体会到的。

曹寅对曹家的兴衰至关重要，可以说兴也曹寅，败也曹寅；从大运河视角而言，曹家兴也大运河，败也大运河——历史上康熙六次南巡行经大运河，曹寅接驾四次使曹家达到鼎盛，又因为接驾四次造成无法弥补的亏空，终为曹家败落埋下祸根。

《红楼梦》中的“江南”

《红楼梦》多处提及江南生活，语言、饮食、习俗、服饰等各项无不

流露出“江南”色彩。细细品读这些内容，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曹雪芹对南京、江南的“乡愁”。

第三回，贾母对林黛玉说：“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这“辣子”就是南京话，此类还有“老爹”“花胡哨”“清爽些”“汗巾子”等。又如第六十三回，贾蓉称凤姐是“凤姑娘”，也是江南话。《红楼梦》中还常常可以听到扬州话，如“这会子”：“这会子二爷在家”“这会子跑了来”（第十六回）；如“才刚”：“才刚老爷叫你作什么？”（第十六回）；还有“吃茶”“吃酒”“下作”等。第六十二回的“一篓炭”“一担粳米”属于江南说法。第七十七回，王夫人说的“卖油的娘子水梳头”也是江南话。

《红楼梦》中的人物服饰非常有特色，作者对服饰、布料等表现得相当熟悉，所安排的各色服饰无论款式还是颜色，都与人物的形象、性格乃至命运有着密切关系。王熙凤见林黛玉时“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袖袄”；贾宝玉见林黛玉时“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宝玉在梨香院见薛宝钗穿着“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等等。以上都是江宁织造供皇宫里用的，即南京云锦。

《红楼梦》中提到多种江南饮食。比如两次提到无锡特产“惠泉酒”。第十六回，王熙凤对贾琏的奶妈赵嬷嬷说：“你尝一尝你儿子带来的惠泉酒。”第六十二回，芳官对贾宝玉说：“我也不惯吃那个面条子，早起也没有好生吃。……先给我做一碗汤盛半碗粳米饭送来，我这里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不许教人管着我，我要尽力吃够了才罢。我先在家里，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第十六回王熙凤说的“火腿炖肘子”，第八回贾宝玉在薛姨妈那里喝的“酸笋鸡皮汤”，第六十二回芳官吃的“虾丸鸡皮汤”“酒酿清蒸鸭子”“胭脂鹅脯”等，都是江南菜。

（据《文摘报》张庆善/文）

陶行知当衣办学

1938年9月，陶行知决定创办一所“难童学校”，专门接收和培育那些流落街头的难童。

1939年7月，从香港回到重庆不久，陶行知便在重庆合川县地处偏僻的古圣寺创办了一所难童学校，取名“育才学校”，并担任校长，学生中有革命烈士的遗孤，也有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的孩子。学校虽然条件艰苦，却吸引了很多知名学者前来教学和兼课。音乐家贺绿汀、电影艺术教育家章泯、诗人艾青、舞蹈家戴爱莲、画家陈烟桥等分别担任各组组长，翦伯赞、何其芳、丰子恺、田汉、姚雪垠等知名学者也常来学校兼课，学校师生最多时有160多人。

由于学生人数不断增多，育才学校的办学经费经常捉襟见肘。陶行知经常要四处奔波筹集办学经费，还写信向各界人士求援。梁漱溟、陈嘉庚、李公朴等民主人士都给育才学校寄过钱和物，周恩来、邓颖超等革命家也多次派人送来办学所需的物资。尽管有各界援助，陶行知的办学之路还是步履维艰。

一次，运送物资和粮食的汽车在路上遭遇日军，不得不绕道多走了几天的路程。而此时育才学校已经钱尽粮绝，百余名师生面临断炊挨饿的局面。陶行知情急之中把衣柜里几件八九成新的呢料大衣和裤子拿去县城的当铺，换成钱买了粮食和蔬菜，总算解决了全校师生一天的口粮。

陶行知能筹集到的办学经费越来越少，他不得不频频光顾当铺，当一些私人物品以解燃眉之急。后来陶行知家徒四壁，仅剩下一套衣服。每次洗了衣服后，由于没有别的衣服可替换，陶行知冬天就围着被子在床上看书，夏天就光着膀子在桌子前写字。等衣服晾干后，再穿上去给学生上课。

育才学校坚持办了7年，直到抗战胜利、内战爆发时才被迫终止。7年间，育才学校共招收了600多名难童学生，后来，其中300多名学生参加了地下党，43名学生参加了华蓥山游击队，有21名学生成了革命烈士。（据《人民政协报》佟雨航/文）

